

就创作规律而言,一切有历史责任感的严肃作家、剧作家在进行构思和创作新作品的时候都会发出这样的自问:我为什么要写这部新作以及如何才能写好这部新作?我在构思和创作每一部文学、戏剧或影视作品的时候不仅要发出同样的自问,而且还要经历长期而又痛苦的深思熟虑,方可动笔进行创作。

自从大型史诗电视剧《寻路》在央视播出以后,来自各地的朋友,尤其是同行的文友不约而同地问我:你为什么要把这段极其复杂的历史搬上电视屏幕,而且还要冠以《寻路》的片名?我思虑有日,遂决定把近3年以来创作《寻路》过程中的甘苦如实地写出,愿听取各方朋友与文友们的批评、指正。

《寻路》,顾名思义,探寻中国革命之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及其志士仁人为探寻中国革命之路前仆后继,用生命铺成了一条革命之路,用鲜血染红了一条红色之路。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她就继承了中华民族这一光荣的革命传统,用生命将这条革命之路铺得更宽,用鲜血将这条革命之路染得更红。为此,成千上万的中国共产党人无怨无悔地倒在了这条革命大道上,是他们的鲜血把这条革命大道染得更红。

《寻路》所表现的就是这条长长的探寻中国革命之路中的一段:自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至1932年宁都会议,短短的5年,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历经千难万险,九死一生,终于探寻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大道——尽管在前进中还有着这样那样的阻力和反复。

这5年,给后人留下了太多的启示,是一笔了不起的精神财富。我是一位年过七旬的老童生,只想用一颗真诚之心去认识、歌颂这段历史,以及带领人民创造这段历史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先贤。

这就是我写《寻路》的缘起,同时也是这部电视剧的戏魂。为了立此存照,我把这段话写在文学剧本《寻路》的前言——《几句想说的话》中。

一、《寻路》的历史启示

自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近6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处在幼年时期,她的核心成员和基本队伍绝大多数对马克思主义知之甚少,对未来建设一个梦想中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则更是茫然——这是因为在他们每个人的心中只有对“社会主义天堂”苏联有着一种最为美好的憧憬,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时绝大多数共产党人只是凭借一腔救国救民的热情,在虔诚地进行着所谓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革命。更为可笑的是,远在莫斯科的第三共产国际并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却又手握尚方宝剑,对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改组赋予生杀大权,对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则更是说不二,他们就像是《西游记》中张开五指如来佛祖,主观地操控着孙悟空等去西天取经那样,严厉地把控着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事后追论,中国共产党参加领导的第一次国内大革命岂能不败?

历史发展有着自身的规律,这不可抗拒的规律一定要惩罚那些尚未认识规律的人。那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天真地认为蒋介石是革命的,真诚地欢迎他为总司令的国民革命军抵定大江南北,进占东方冒险家的乐园——上海。令共产党人猝不及防的是,蒋介石突然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叫嚣对共产党“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个”的反动口号,对中国共产党人发动了最为疯狂的反革命大屠杀!刹时之间,神州大地到处都是白色恐怖,无数的英雄悲愤地飘游在血雨腥风之中。这时,也惟有在这时,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才会悲怆低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

是啊!中国真正的革命之路在何方?

时人和后人皆知:在共产国际起伏变化的历史中,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的革命只有两次,一是法国的巴黎公社起义,再是俄国的十月革命,前者失败了,后者成功地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虽然这两次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的革命发生在不同的国家,且又前后相距几十年,但是他们的革命形式却是相同的,那就是以城市为中心发起暴动进而夺取国家的政权。这就是共产国际尊称为的十月革命之路

电视剧《寻路》创作谈

□王朝柱



或曰城市中心暴动之路。

大革命失败之后,处于徬徨中的志士仁人异口同声地发出这样的自问:中国革命向何处去?远在莫斯科的第三共产国际武断地下达了命令: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在大江南北、黄河上下举行城市暴动,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启了长达近8年的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他们先后举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两打长沙……待到李立三左倾路线在党中央取得统治地位之后,竟然认为全国范围内的革命高潮不仅要马上普遍到全国,而且还荒唐地认为中国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并将掀动世界的高潮。他除去以中央名义发出《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还公然提出会师武昌、饮马长江、直捣黄龙的可笑口号。结果,导致了全国白区百分之百、苏区百分之九十大失败。由此,也授给了蒋介石屠杀中国共产党人的借口。据史料记载,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被杀害的著名共产党人有陈赞贤、杨闇公、汪寿华、邓培、李大钊、陈乔年、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向警予等数十人;1927年3月到4月,前后走上刑场的中国共产党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超过12万人,从是年5月到11月被杀害的革命者有16.8万人。如果加上在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下牺牲的革命烈士和工农群众、革命学生,何止百万计啊!我想这些长眠地下的英灵一定会大声疾呼:“在中国搞城市中心暴动是条葬送中国革命的死路!”

但是,远在莫斯科的第三共产国际撞了南墙还不回头,继续派遣在苏联学习并忠诚于共产国际路线的留学生回国,顽固地坚持城市中心暴动的道路。他们不仅在党的中央机关公开地大搞教条宗派式的结党营私,而且还无情地打击远在井冈山、赣南和闽西等地努力探寻“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之路的毛泽东等同志。

说到毛泽东,我就很自然地会想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古语。如果再加上他的出身、养学以及丰富曲折的革命经历,使他又养成了独立思考,不迷信权威,只相信真理,敢于抗上的叛逆性格。因此,当大革命失败之后,他断然地谢绝了瞿秋白希望他到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好意,坚定地说了这句史有所记的话:“我不愿意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好汉。”

从此,毛泽东站在“枪杆子里边出政权”的革命起跑线上,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一条探寻“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式的革命道路。请看:

秋收起义失败之后,上自湖南省委,下到参加秋收起义的不少同志仍然坚持执行中央攻打长沙的命令。毛泽东审时度势、力排众议,反复说明不能攻打长沙的道理,遂带领绝大多

数工农红军向罗霄山进军。为了凝聚革命力量,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三湾改编;为了寻找革命的落脚点,他在改编王佐、袁文才部队的基础上,逐渐创建了中国第一个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与此同时,中央以秋收起义失败和不继续执行中央命令攻打长沙等大中城市为名,开除了毛泽东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事后,湖南省委特派员又误传开除毛泽东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就是开除党籍,遂在红军指战员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毛泽东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稳定和发展,十分大度地说,那我不当前委书记了,改当师长,继续指挥工农红军打土豪,筹款子,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对此,毛泽东同志不止一次地笑谈自己当过几个月的民主人士。

朱德、陈毅率部上井冈山,实现了朱、毛两大红军的会师。虽说革命队伍壮大了,但这两支红军队伍又因构成、领导作风等不同,很快又在建军、根据地等原则问题上发生了分歧。由于革命形势瞬息万变,这种原则分歧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且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遂先后导致了工农红军在湘南的失败和南下粤东的失败。尤其在陈毅两次取代毛泽东为前委书记期间,严重地破坏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削弱了工农红军的战斗力。对此,毛泽东先是坚持真理,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接着,当他感到无力回天的时候毅然决定愤而辞职,上山养病。不久,陈毅自上海带回中央要毛泽东复出的来信,朱德又真诚地说出“朱毛不分家,一分家就打败仗”之后,毛泽东同意复出,并召开了著名的古田会议,从理论上解决了有关长期争论的建军原则问题,从组织上对工农红军进行了相应改组。

接着,毛泽东顶着中央数次下达攻打大城市的命令,和朱德、彭德怀等率领工农红军冒着严寒酷暑转战千里,克服千难万险,取得了三次反“围剿”战争的伟大胜利。同时,毛泽东也在指挥反“围剿”的战争中锻造成一位杰出的军事战略家。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终于探寻出一条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之路。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探寻中国革命之路的真实写照;一条是教条式地照搬苏联十月革命,走城市中心暴动的道路,把中国革命引向失败;一条是从中国实际出发,逐步地探寻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把中国革命引向最后的胜利。

这也是《寻路》留给后人的历史启示。

二、《寻路》的现实意义

历史是一面镜子,可鉴古今、知兴衰。从这个意义上讲,第一代共产党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带领工农红军抛头颅、洒热血,演出的这部大



剧“寻路”中的经验和教训,对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中国梦”——继续探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是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的。

其一,道路决定命运

中国共产党参加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为什么失败?因为那时的党中央在第三共产国际的领导下,走的是一条放弃领导权,不懂得“枪杆子里边出政权”,完全为国民党做嫁衣的错误道路。十年内战——或曰土地革命时期搞的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为什么全都失败了,因为那时的党中央顽固执行的是一条错误的城市中心暴动之路。同样,白区的工作为什么会遭到百分之百的损失,他们撤到中央苏区之后,为什么在他们的领导下,中国工农红军会被迫退出中央苏区,遂又演出一幕“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毛泽东语)的长征?因为执行的还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主张。

对此,我们不能不问那时党中央的负责人——尤其是从法国、苏联留学回国的领导者们,你们为什么会犯如此严重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呢?在我看来,这些同志大多出生在富余的家庭,从小就就不了解身处低层的农民,更不了解黑暗落后的旧社会,仅仅凭着一腔救国救民的热情少小离家,远赴他国求学。因此,他们很自然地只知外国先进,不知中国为什么落后。因此,他们回到祖国以后,很自然地会形成不顾国情,死死地抱住外国的强国之路,打算一夜之间就把贫穷落后的中国变成苏联。可以想见,由他们这些言必称希腊,口必说苏联的“客里空”领导中国革命岂能不败?他们所说的“山沟里出了马克思主义”,批评毛泽东倡导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否定“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等理论,是何等的无知和可笑。

诚如前文所述,毛泽东生在农村,成长在动乱的旧中国,他不仅了解我国的国情,而且更是熟悉中国不同阶层的农民,加之他注重调查研究,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终于历经长达5年的革命实践,和他的战友们一起在井冈山、赣南闽西中央苏区探索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正路,并取得了三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

这是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向人们昭示了一个真理:革命道路的正确与否,决定着中国革命的胜负。我作为《寻路》的编剧真诚地希望,为了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复兴,中国人民一定要走在革命的大道上。

最近,习近平同志语重心长地讲了这样一段话:“全党同志必须牢记,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多么不容易,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下去。”

其二,先知先觉们的蜕变与重生

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为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一批又一批自誉为先知先觉者们争相向西洋欧美诸国、向东洋日本游学,希望窃取所谓的天火照亮黑暗的中国。这就是我国最早的知识分子。

说到知识分子,我很自然地会想到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意思是说知识分子不是独立的阶级,他们的社会活动必然依附于一个载体上。同时,我又想起动笔写《辛亥革命》前的一件往事:中央主管部门的领导两次和我约谈,明确指出,“一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告别革命论’”,二要指出参加辛亥革命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两面性,即革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

但他们在革命中的言行和功过又是十分复杂的。”对此,我是赞成的。

在我动笔写《寻路》之前,我又细心地清点这些先知先觉回国后的革命经历和下场,再次发现有些风云一时的先知先觉蜕变了,一步一步地走向自己的反面,甚至成为反动统治者的帮凶;还有一些窃火者从容不迫地走上统治者的绞刑架或断头台,他们的灵魂得到了升华和重生。如果我们把探寻中国革命之路比做一个熔炉,这些先知先觉有的经不过炉火高温的冶炼,遂蜕变成一堆炉渣;有的就像孙悟空一样炼成了铜骨铁身、火眼金睛。请看:

汪精卫曾是同盟会时期宣传革命的笔杆子,后又是孙中山先生的文胆和接班人。但是,他一俟从政争权,思想迅速地向着反动的深渊滑落,待到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他很快又变成了万夫所指的头号大汉奸。

廖仲恺与汪精卫同是同盟会、国民党的骨干。孙中山先生仙逝之后,廖仲恺因坚持孙中山先生亲自制订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遭到国民党右派的暗杀。但他的革命精神却在熊熊的烈火中得到了重生。

陈独秀、李大钊同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时人尊称为南陈北李。后因陈独秀蜕变为托派,被党中央开除出党。李大钊因在北平坚守革命,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送上绞刑架。他的革命灵魂同样也得到了重生。

我在创作文学剧本《寻路》的时候,也多次触碰到这个议题,同是向西方窃火的先知先觉,王明蜕变成苏联攻击中国的叛徒,而革命烈士恽代英、蔡和森等虽死犹荣,他们的精神化做了浴火重生的凤凰,自由地飞翔在万里长空。

从某种意义上说,蜕变与重生也是一种规律,一定会在不同的革命阶段中发生。换言之,既然改革开放是一场革命,那些曾经将改革开放叫得很响的先知先觉们也会蜕变与重生。为此,我希望看过《寻路》的观众要擦亮双眼,看看他们之中有没有人蜕变成叛徒,或拿着外国的钱当间谍出卖国家的利益,或把贪污来的一大笔钱送往外国的银行……惟有如此,我国才能确保江山万代不变颜色。

其三,理想与信仰

理想,是革命者为之终生奋斗的方向;信仰,是革命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诚如习近平同志所言:“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

为此,我创作的《寻路》就是要浓墨重彩地张扬革命的正气,在每一位革命家的中牢牢地竖立一杆理想和信仰的大旗,光照千秋万代,昭示革命自有后来人。请看:

周文雍、陈铁军相伴走向刑场,向世人宣示举行刑场上的婚礼;杨匋安写下“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的绝命诗,从容地走上敌人的刑场;杨度在实现了“但俄松树当公事,愿与梅花结后缘”的理想大愿之后,又挥毫写下这首自挽联:“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遂安详地驾鹤西去。同样,程代英、蔡和森、彭湃等烈士都是高喊着“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等革命口号从容就义的。

同时,《寻路》也重笔写了革命队伍中失掉理想和信仰的叛徒。当革命处于低潮时,他们在生死的考验和利益的诱惑下,一个个无耻地出卖革命、出卖同志。事后追论,贪图安逸、生活腐化是他们政治上堕落的开始。如党的总书记向忠发把 tình 情置于党的利益之上,终被敌人逮捕;顾顺章玩女人、抽大烟,违背党的纪律耍魔术,密送敌人手中。如果没有钱壮飞同志破译密码,设在上海的党中央就会全军覆没。这是何等严重的教训啊!

时下,随着改革大潮的冲刷,党的一些高级干部腐化堕落,相继落马,在群众中造成极坏的影响。为此,《寻路》的播出,使人民群众对中央从改进作风入手,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必将会有更深入的理解。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34个年头,且摸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我依然认为,如果中国改革开放要想大踏步地前进,全党、全国人民还必须继续探寻改革开放之路。

这就是为什么我写《寻路》的原因。

千古长青的艺术大树

——赏析袁晓岑的孔雀画和仙鹤图

□吴德铭

美术家袁晓岑是在中国画和雕塑两大造型艺术领域里双管齐下、比翼共飞的大家,无论在二维平面抑或三度空间的形式中,他都取得了卓尔不群、世人瞩目的艺术成就。这里仅只他的写意花鸟画谈点个人的认识。

写意花鸟画,是袁晓岑中国画的主要题材取向,其表现对象是相当广博的。诸如:高洁艳丽的孔雀、俊逸雅娴的仙鹤、秀巧玲珑的翠鸟、温和柔顺的鸽子、稚拙可爱的鸡雏、先知“春江水暖”的鸭儿等等禽类,不一而足,且都曲尽其妙、各异其趣。而其中数量最丰富、造詣最深湛、影响最远大的代表作,莫过于蜚声中外的孔雀画和仙鹤图。国画大师曾曾在袁晓岑的《荣宝斋画谱·花鸟部分》的序言里写道:“孔雀和仙鹤是华贵与野逸两词的最佳诠释,而当今中国画坛,辩证地把握这两种对立的美,并创造性地推进了中国花鸟画进程的大师,当首推袁晓岑教授。”1951年袁晓岑创作的国画《孔雀》即参加全国第一届国画展览;1983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访问日本时,曾将袁晓岑的《鹤舞图》作为国礼赠予日本首相铃木善幸;1984年应北京人民大会堂之邀创作国画《孔雀》《白鹤》,花鸟画《版纳林景》被选入第六届全国美展并由中国美术馆收藏;1985年另一幅《鹤舞图》被瑞士国家银行及苏黎世市政府收藏;1988年巨幅国画《瑞鸟图》(5米×2米)悬挂于北京人民大会堂三楼中央大厅;1992年,江泽民主席将袁晓岑的《白鹤》馈赠日本国会议长;1993年,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则把《孔雀开屏》赠送给了泰国“王姐”;1999年84岁高龄时,还应邀为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创作一丈二尺大的《孔雀图》……袁晓岑曾为西欧、东南亚及日本等国的我国驻外大使馆创作了几十幅国画,其中大多为写意孔雀和仙鹤。可谓袁派美禽飞天下。

袁晓岑对这两种珍稀珍禽情有独钟、爱不释手,滥觞于他



的生活经历、知识修养和美学理想。袁晓岑在写意孔雀和仙鹤创作上的成就,首先归源于客观生活的厚赠和大自然美的惠赐,他对生活和自然的无限挚爱以及在实践中培育的敏锐的观赏、感受能力。他是用自己虔诚的心灵去敬奉自然女神,用最热烈的感情来表现以孔雀、仙鹤等为主体的花鸟世界的。

1915年6月,袁晓岑出生在贵州省普定县一个偏僻而美丽的山区。因是单家独户,举目渺无人烟。他从小与飞禽走兽为邻,与山花野卉朝夕相处。画眉、山雉、锦鸡、仙鹤、苍鹰、啄木鸟、猫头鹰等等野禽,终日在他眼前喧唱、飞舞。神奇美妙的童话般的自然景观成了他少儿时的教科书和大画册,使他“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语),对动植物滋生浓厚的

兴趣,以至萌发了描摹这些“人类之友”的“创作冲动”。在贵阳师范学校和云南大学读书时,他坚持到野外和动物园写生。为日后的花鸟画创作积累了素材,奠定了基础。30年代中期,袁晓岑曾私淑岭南派画家高剑父、高奇峰兄弟和陈树人等,在花鸟画的取材、构思和表现手法上深受启迪。1942年,徐悲鸿旅居昆明时,看赏了袁晓岑的孔雀画,当面对他亲切地教诲和鼓励道:“自古以来画孔雀的人不多,你既能以造化为师,又有云南产孔雀等好条件,只要坚持钻研,锲而不舍,将来会独树一帜,必然成功。”促使他在艺术上取得长足的进步。新中国成立后,袁晓岑更自觉更主动地深入生活,进行各种艺术实践。这使他的花鸟画真正实现了“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张璪语),另辟蹊径,别开生面,既突破前人窠臼,又超越自我框架,充分展示了独出心裁的审美创造性。

为了经常观察孔雀的生活习性和各种形态姿势,深入研究它的生理结构,袁晓岑甚至亲自饲养过孔雀,还动手制作过孔雀标本,对这珍禽的每根翎羽乃至每个骨胳、关节都进行了精細入微的考察和剖析,可谓熟谙于心、了如指掌。由于袁晓岑从实际生活中获得了丰富的知识、经验和深切的审美感受,又有严谨不苟的科学态度,他笔下的孔雀不仅造型准确、逼真、活脱,而且多姿多彩、栩栩如生、超尘脱俗、不同凡响,真正达到了“迁想妙得”、“传神写照”的美学境界。试观袁晓岑绘作的千百幅孔雀画,内涵丰富、构思多样、形态各异、气势不一,且都体现了“形神兼备”、“气韵生动”的写意要求。袁晓岑的写意孔雀,亦每每有妩媚绰约的风姿、典雅浓丽的色彩(特别是尾翎部分),却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生气勃勃野趣盎然,突破了前人的窠臼,具有独特的个人风范,确实达到了自然美与艺术美的和谐统一。袁晓岑善于以简约精粹的笔墨,着力描绘孔雀的各种寓有动势的姿态,常常在豪放中露俊爽,萧疏中见严谨,甚至是在狂肆纵恣中表现孔雀的灵性和天趣,宣泄画家自己的情愫和诗意。他多以鲜艳明丽的色彩和酣畅淋漓的墨色相映衬,以及奔放挺健的笔法,浓淡有致、疏密相间、疾徐参半、润燥相济的线条,使整个画面显得清秀丰润而又空灵含蓄,从而给人以超逸时流、格调一新的特殊美感。这正印证了画家本人的审美目标:“发自我之性灵,探求自然之美,吸传统之精神,走自己之道路。”

晚年的袁晓岑除了持续不辍地画孔雀外,投力最大的是创作写意仙鹤。那另一群大自然的精灵,从他的生花妙笔下纷纷飞腾而出,犹如异军突起,云集画坛,形成一派簇新的艺术风景线,大有同他自己的写意孔雀争竞媲美之势。可谓一手双绝,珠联璧合,交相辉映。

袁晓岑对仙鹤的钟情和厚爱,无疑也植根于长期的生活积累、大自然的陶冶以及由此茁长的审美情趣。除了早年在故乡山野时常接触鸟外,后来他在云南的昭通、丽江等地区曾多次观察这些珍禽的活动规律和生态环境。当他感悟生情、艺兴勃发、全身心地投入创作时,他对自己孵化、哺育的一只只活脱脱的宠物,如同孔雀一样,无不倾注了一片童心和悠悠深情,寄寓了他的生命体验、人格力量和精神追求,正所谓“神具心胸而生自指腕”。1993年面世的巨幅国画长卷《百鹤图》,集中体现了袁晓岑写意仙鹤的美学特征、老当益壮的艺术功力与炉火纯青的表现技巧。

《百鹤图》长27米,宽1米,共绘仙鹤整100只,宛若一首饱含意蕴、情趣盎然的长诗,一部优雅动人、回肠荡气的交响曲。它凭借100只仙鹤美妙的排列组合和丰富多变的动态,使它们活像一卷五线谱上的一个个硕大的跳跃音符,向人们娓娓动听地吟诵着一组鹤国的故事,令人心驰神往、遐想联翩、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展开画卷,徐徐赏阅,只见丹顶雪白的鹤群祥云般地从天际飞来,轻盈地飘落在广袤的原野上,它们忽而争先恐后地捷足奔跑,竞相觅食,忽而振翅引颈、仰天长鸣,忽而彼此依偎、梳理羽毛,忽而恬然自适、安然入睡。俄顷,似从梦中苏醒、翩跹起舞,群情激荡,如痴如狂。继而,又是一派展翅奋逐的热烈场景。最后,鹤群接踵冲天而去,气宇轩昂地向寥廓的远方。整个画面情节跌宕、波澜起伏、变幻多端而又虚实相生、疏密有致、气势连贯,充盈着诗歌的意境美、韵味美,音乐的旋律美、节奏美,无怪乎电视台拍摄了这幅长卷的全部画面后,得以依循该图蕴涵的内在韵律谱曲配乐,使和谐一致的画示展于荧屏。

如今袁先生虽已作古,但他对艺术孜孜不倦的追求、创新精神和光前耀后的辉煌成就,将永远是云贵高原上傲然挺立的一株长青的文明大树,是艺术家和一切文艺工作者学习的楷模。